

乾元十背錢

乾元重輪錢

乾元重寶背云

乾元重寶背雀



乾元重寶背雙尾云

钱货可议

大曆元寶

唐代货币史钩沉

唐中興寶

杨心珉 著

中孚錢

乾通玄寶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應元元寶



钱货可设

金代货币史考论

张其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资助项目成果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书画艺术研究中心资助研究成果
江苏省艺术强省建设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研究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问津文化教育研究院2018年资助项目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社会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成果

钱货可议

——唐代货币史钩沉

杨心珉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货可议：唐代货币史钩沉 / 杨心珉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5561-8

I. ①钱… II. ①杨… III. ①货币史—中国—唐代
IV. ①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96484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钱货可议

——唐代货币史钩沉

杨心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5561 - 8

2018年2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2

定价：52.00 元

序 言

心珉自幼热衷于收藏古代钱币，硕士学习阶段又主攻明代货币史，在货币文物的鉴定和研究方面积累了二十余年的经验和心得。2012年考取为我的博士生后，心珉表达了深入研究中国中古货币史的意愿，渴望在探索中国货币发展脉络的道路上有所建树，希望我能给予帮助和指导。在多次商议之后，确定了心珉的毕业论文以唐代货币史为主要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知识界对货币文物一直给予着持续的关注，自南梁顾烜首著《钱谱》，历朝历代均有相应的著作问世。特别是清季考据学兴起之后，文人学者对于古代货币的研究更加痴迷，涌现出以翁树培、刘燕庭、鲍子年、李佐贤为代表的一批卓有见识的泉坛名宿，但客观来看，当时对于货币文物的研究，还停留于单纯的收藏考证阶段，人们往往执着于对奇品、稀品的搜求，而忽视了其对于了解社会经济面貌之帮助。事实上，作为社会经济运转的物质载体，古代货币对于我们全面、细致地研究货币所行时代的经济史及相关问题，极为重要，帮助巨大。对相关货币的整理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史料记载之不足，而且相对于文献史料来说，货币更具直观性、可靠性，无疑是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是故民国建立后，伴随着现代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货币文物开始打破古董雅玩身份的束缚，逐步体现出真实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以丁福保、郑家相等为代表的泉学家积极开拓视野，结社立刊，当时创办的《泉币》、《古泉学》等刊物，已让人明确感觉到泉坛的研究境界正在由潜兴猎奇向借物论理的层面提升；而另一方面，史学界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货币文物的研究价值，在由社会经济史学泰斗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中，利用货币材料，甚至直接讨

论货币发展相关问题的文章，为数不少。然而随着抗战爆发，泉学社团终止活动，《食货》杂志亦告停刊，学界对于货币文物和货币史的关注重新归于沉寂。

新中国建立以后，货币史研究领域成果层出不穷，其中尤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一书影响最为深远。彭氏既精于货币文物的研究，又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加之以治学严谨，视野开阔，用力勤苦，故其所作《中国货币史》学术质量之高，诚为中国货币史研究领域之翘楚。所憾者唯因篇幅所限，对各朝代之货币流通具体情况，不及作更深入细致之解释，为后世学者继续探索提供了空间。多年来，在《中国经济史》一类的经济通史著作中，虽然也对各断代的货币问题有所论述，但限于体例，亦难以全面展开深入探讨。2003年，汪圣铎《两宋货币史》出版，该书对有宋一代货币之铸造、发行、流通等诸问题，皆作了细致入微的解答，开货币断代史研究之先河，而在唐代货币史方面，学界至今还没有体系化的成果。有鉴于此，我建议心珉发挥自身优势，将货币史研究的时空坐标，划定于有唐一代，在兼顾实物考证的同时充分挖掘货币所蕴藏的史料价值，以期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取得较大的突破。

目标明确后，心珉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献阅读、史料搜集、相关货币理论学习及有唐一代货币实物的全面搜集、考证中去。数年之中，除上课之外，心珉废寝忘食，孜孜矻矻，经常为一款货币之流行时间、地域范围，影响大小，反复推敲，数年之后，终于推出了这部唐代货币史研究的专著。这一成果，不仅有从实物出发的考证推敲，也包含立足于经济史角度的探索和分析，且所论多有新意，博士论文答辩时，颇得诸评审专家之好评，后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为其博士学习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亦可谓不负我望了。近日得其来电称此作将由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够得此机遇，亦足以作为其执着向学的回报了。欣喜之余，草成此文代作序。专著虽已出版，研究却无穷期！希望其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再攀高峰。

李天石

丁酉年春于随园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对唐代各品种钱币的新探索	23
第一节 开元通宝钱的相关考证与研究	23
第二节 乾元重宝钱的相关考证与研究	39
第三节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非安西都护府铸造说：兼谈单字钱的 性质问题	56
第四节 咸通元宝为马楚政权铸造说	68
第五节 现定刘氏诸钱为史氏政权铸造说	78
第二章 唐代钱币的铸造与生产	92
第一节 唐钱的基本铸造方法研究	92
第二节 唐钱的金属成分问题探讨	107
第三节 唐代铸币机构辨析	125
第四节 铸币审核制度的萌芽：唐宋两代进呈样制度之对比	136

第三章 唐代钱币的流通与管理	139
第一节 私铸问题的延续与初唐政府的缉私政策	139
第二节 开元、天宝之际的货币制度改革	151
第三节 肃宗、代宗时期的币值变动与中晚唐的钱荒问题	165
第四章 唐代金银的货币化问题	188
第一节 初唐时金银货币地位的丧失	188
第二节 中唐时金银货币功能不能恢复的原因	191
第三节 晚唐时期金银货币功能的逐渐复苏	196
第四节 晚唐时金银货币功能复苏的原因分析	200
第五节 晚唐时期金银流通的局限性	204
第六节 对岭南地区货用金银问题的再考察	205
参考文献	210
后 记	222

绪 论

一、唐代货币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

如果以宏观的角度放眼整个中古史的各个阶段，有唐一代无疑会以其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吸引人们的关注，这种特性广泛存在于当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深深扎根于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方式的经济活动中，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唐代经济史一直以来都与中国古代史分期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变迁等重大课题关系密切，是研究者们考察与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

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货币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地位无疑是极为突出的。一方面，作为实物而存在的货币本身就是其所处时代经济事务的直接体现者，因此能够真实折射出该时代社会经济运转的大量信息，从文物角度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另一方面，政府及社会对于某一时期货币及货币经济运行的关注和态度无疑是该时期经济材料中最为中心的部分，也是研究包括财政运转、赋税收支、政治走向乃至社会文化发展细节等具体问题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从这个角度看，货币史在整个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无疑就显得十分明确了。

尽管拥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学术价值，但从客观的角度看，目前学界对于货币史研究的关注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恐怕主要与该课题对多学科交叉方面的特殊要求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及文物学界的合作日渐频繁，但考虑到古代货币绝大部分都属于普通文物，因此与之相关的信息

实为各类发掘与发现中较微观的细节，即便是专业的文物工作者也往往存在与之相关的知识缺口，故对于所获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本身就常常存在问题，而普通历史研究者们理解和利用这些信息的难度恐怕就更大了。

另一方面，自考据之风在民间兴起以来，大量古代货币实物便开始向社会流散，这无疑为货币史研究的开展增加了难度。尽管在古今金石学家所著的泉谱及收藏笔记中我们还能了解到许多货币的相关信息，但由于缺乏正规的考古发掘过程，许多货币的自身性质到今天已很难了解，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收藏者的鉴定水平参差不齐，大量伪品也充斥于这些相关材料之中，这种对于材料本身的真伪考察难度很大，也令许多本身就不精于此道的普通历史研究者们在不置可否间望而却步。

除此之外，在大多数朝代，“重农抑商”都是统治者们实施管理的基本方针，而这一方针导致了史料对于货币生产、流通与管理的相关记载比较匮乏，提及之处亦多宽泛之词，其具体的细节往往不加描述。而这些信息断层只能通过学者自身的考察与分析去加以填补，其难度可想而知。尤其是当研究的对象有了时空的界限，使得可使用的参考资料再度受到限制的时候，相关研究的开展就更加不易了。也正是因为如此，目前学界在货币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往往以像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这样的通史类为多，而以一个时期内货币与货币制度、货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体系化货币断代史知名学术成果则仅有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等数种而已，即使如黄锡全《先秦货币研究》这样有一定的对象限定的论文集式著作亦较罕见，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考虑到唐代经济史与诸多重大课题相关的突出地位和唐代货币与唐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唐代货币史的学术研究价值绝不低于秦汉与两宋。但由于基础成果的相对缺乏，在短时间内寄希望于全面系统地对唐代货币史的每一个问题都给予极有质量的探讨恐怕是好高骛远的。故笔者在本书中率先对与唐代货币史相关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展开分析，以冀对今后更为深入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

二、唐代货币史研究既有成果评述

前文已经提到，目前学界尚没有针对唐代货币史的体系化研究著作，而较有篇幅的成果多见于各类货币通史中。其中，彭信威所著《中国货币史》的唐代货币部分是相对而言结构较为完整的，除了作为正式货币的铜钱，在唐代拥有货币职能的绢帛与金银也都在其讨论范围之内，并设有专门的篇章加以分析。由于彭氏本人经济学造诣很深，故其所论之着眼点不仅局限于货币本身，而是辐射到与之相关的所有经济现象，尤其对唐代的物价波动与货币流通间的关系关注最多，其理论对后世研究者的影响也较深远。一般来说，在有关唐代问题的讨论中历史学界习惯以前期、中期、后期的三分法划定时代界限，但这一划分法并不完全适用于经济问题，如草率套用可能会导致最终结果准确性的偏差，尤其是中唐一段政府几度更迭政策，社会经济亦随之起伏转折，这种变化值得注意。作为货币通史中较早面世的著作，《中国货币史》明智地发现了“安史之乱”后通货贬值与贞元后通货回缩之间的矛盾，并将之分列章节区别讨论，使得后世研究者在撰写货币通史类著作和相关论文时纷纷效仿其时代结构，从而避免了理论的正确性因结构的不合理而受到影响。另外，在历史学研究规范方面，彭氏自《中国货币史》于1954年初版以来即不厌其烦地对其具体内容进行一再调整，以避免出现谬误，而在具体的论证工作中，彭氏在史料的选择利用问题上下了功夫亦深。在讨论唐代物价变动时他多次指出，“文献中的记录，多是特殊的物价”^①，即由于战争、灾荒或丰稔等特殊原因而出现的價格，且其具体数字多存在夸大，不能盲目信任其史料价值；而当其他学者的成果中出现相应的问题时，他亦往往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比如在讨论唐代金银的货币职能问题时，他尖锐地指出日本学者加藤繁在研究中由于混淆了古今语义中“金”的概念而导致的夸大金银货币地位的错误^②，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在起到警示作用的同时还有助于后世研究者客观认识前人的观点，其学术意义可谓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彭氏本人对于传统钱币学与考据学的认识也较一般现代学者深厚，这一特质使得他在分析问题时总是能照顾到货币的文物属性，从而使结论更加精致准确。如在对比唐代与两晋的金价时，彭氏注意到了这两个时期度量衡制度与货币质量间存在的差异，因此没有迷信文献数据而给出草率地判断^①，这种在理论架构的同时照顾物质标准差别的研究方法对本书的研究给出了重要而具体的指示。当然，对于彭氏来说，货币绝不仅仅只是理论研究的附加参考材料而已，事实上这些特殊的文物本身就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因此对各时期货币种类与性质的考察也在《中国货币史》的具体内容中占据了很大比重，而在进行这种考察的过程中，彭氏本人渊博的学识又使其不至于回归到苦搜文献的状态，而是以极其开阔而活跃的思路示人，许多观点都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比如唐钱上铸造的月形纹饰之功能与含义历来是唐代钱币学的重要谜团之一，而彭氏依据外国钱币中的星月纹饰提出这种月纹可能是由西域传入，甚至与安禄山有关的假说^②，由于材料的相对缺乏，相关的论证虽不可谓十分精确，但这种放开视角，跳出文献谈实物的方法还是让笔者深受启发，对本书的撰写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除了《中国货币史》，目前知名的货币通史专著尚有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以及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等几种，这些著作与唐代货币有关的章节内容亦较充实，且各有独到之处。在彭氏《中国货币史》中，初唐时期颇具规模的私铸问题虽也有所提及，但并没有专门立章节展开讨论，而萧清在编写《中国古代货币史》时显然发现了彭氏的不足，将私铸盛行作为初唐时期货币经济面貌的一大特征，不仅专列章节加以详述，所论亦颇有值得借鉴之处。他通过考察史料后认为“唐代前期的私铸及恶钱流通问题，是在流通过程中货币经常相对不足的情形下发生的”^③，从而将私铸现象的性质由特殊的个体行为上升到普遍意义的经济现象，而从这一观点出发重新审视一些旧的文献材料，所得的信息就变得更加立体化了。比如此前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8 页。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1 页。

③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4 页。

学者多使用贞观年间斗米数钱的记载作为唐太宗德政的证据，而从萧氏的视角看，这种低廉的物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通货不足的客观反映^①，而“谷贱伤农之声屡闻”的事实也在从侧面不断冲击着学界对初唐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抱有的固定政治道德观，而这也正是货币史研究以小见大的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在议论过程中时时注意区域之差别，也是萧氏的一大特色，在分析唐代绢帛的货币职能时他指出，由于“盛产茶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也是盛产丝织物的地方”，因此中唐以后茶叶贸易的迅速兴起和商品化并没有对绢帛的货币职能形成推动，而是“扩大了铜钱的流通”^②。另外，萧氏引用敦煌文献中的大量材料证明唐代农村中普遍存在以绢帛米粟支付的现象，但并没有将这些现象上推至普遍意义，而是认为其“反映出当时农村中货币经济的不发达状况”^③，更为突出的是，他敏锐地观察到云南地区中古时期尚在流通贝壳，货币经济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的事实，故将云南与其他地区分开区别讨论^④。这些安排无不显示了作者对于区域史学自始至终的强烈关注，对笔者启发很大。

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是继彭氏与萧氏著作之后的一部货币通史专著，虽然该书对唐代铜钱的分析与研究并未从整体上超越前人的成果，但在讨论唐代绢帛与金银的货币职能时其亮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如在分析唐代绢帛的货币职能时，宋氏的叙述可谓详尽，对绢帛行使货币职能的原因和兴衰过程均有详细介绍，尤其是涉及唐代法律对于绢帛货币地位的保护问题的大量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彭、萧著作之空白^⑤。另外，在谈到唐代金银的流通问题时，宋氏率先注意到了西域金银钱在唐代的流通和影响，这部分内容也对本书的写作起到了重要的帮助^⑥。相对于前三部著作，千家驹与郭彦岗合著的《中国货币演变史》一书在论述的精密程度上无疑要逊色许多，但该书亦拥有结构简洁、条理清晰的特点。在讨论开元通宝铸行后的意义及“安史之乱”后的通货膨胀的情况时，作者都以极简洁的文字搭建了清晰的框架，而这种结构上的明晰性，也

①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

②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③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④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⑤ 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⑥ 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货币通史类著作之外，一些经济史、财政史以及区域货币史著作中也有较多有关唐代货币与货币经济的内容，这些内容亦往往因研究者视角不同而各有独到之处。李剑农所著《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是1949年后出版的第一部经济通史著作，对后世影响颇深，其对于历朝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亦十分重视，并一一为之开辟专门章节加以论述。该书涉及唐代货币的部分内容，对唐代社会中流通的铜钱、绢帛、金银及货币信贷现象均有讨论，尤其是对商业资本的流动轨迹和流动方式颇有见地。他认为，唐代的官僚阶级经营各类商业活动的情况极为普遍，并举大量材料以证明之，这一事实无疑暗中引导了经济发展的走向^①。他提出，自唐朝建立之后，商业发展的走势呈逐渐向上趋势，其证据主要有三点：一为官营借贷利率的一再降低；二为柜坊等“资材存贮机关”的产生；三为汇兑制之产生。^②由此，该书将唐代货币信贷现象与整体经济发展脉络联系在一起，较之其他许多著作就事论事的研究结构更具理论高度。而且，有具体变化和现象参与的论述，较之许多研究者单纯从史籍中的描述性文字看待商业经济面貌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务实。尤其是在论述“飞钱”受政府禁止的原因时他指出，“飞钱之行，其初实为巨商与军阀官僚间彼此谋方便之计”，故其“实为私家富人敛积现钱”的一种手段，也是“招致钱荒之一原因”。^③这种观点与大多数学者以“飞钱”为钱荒之后为经济运作而产生的观点恰恰相反，使笔者深受启发。张泽咸所著《唐代工商业》一书为以唐代工商业经济为考察对象的重要学术成果，该书开辟专节讨论唐代的铸币事务，对有关机构设置、铸造方法、铸造数量、铸造成本等问题均有论述，并对有问题的史料进行了相应的考察，指出《新唐书》中杨於陵所言唐开元时岁铸额达百万的描述有误^④，这种谨慎的研究态度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媒介，货币无疑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而在众多讨论唐代财政面貌的著作中，李锦绣所著《唐代财政史稿》无论在内容的充实

①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2页。

②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3页。

③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7页。

④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性还是体系的完整性上都较为突出，在目前唐代货币史类专著尚未问世的情况下，该书对于本研究开展的帮助自然是巨大的。对于唐代货币及货币经济，李氏一直以来都有着独到而细致的关注，1989年还曾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唐代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一文，对唐代后期影响深远的虚实钱制度展开研究。一直以来，学界多以肃宗朝发行的二式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的比价波动来解释唐代文献中频繁出现的虚实钱问题，而李氏的研究则指出“影响唐后期整个财政的虚实钱，并不是正史食货志中有虚实之名的开元钱，而是源于作为货币的绢帛的虚实估”^①。然而在此后，魏道明发表《略论唐朝的虚钱和实钱》一文，通过《旧唐书·食货志》的详细记载证明了上元、宝应年间的虚钱指被加抬价格后的开元通宝钱这一事实^②，使得李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最初的观点，并在《唐代财政史稿》一书中采用了魏氏的观点，将上元、宝应年间的虚实钱与后世的虚实钱分开看待。而在与货币有关的宏观学术视角上，李氏亦有其自身独到的一面，她认为，“与魏晋不同的是，唐代谷物退出了流通领域，只有绢帛在流通领域充货币之用，而一般等价物是铜钱，绢帛支用需折为铜钱，然后才能交易。估法的出现使绢帛充当支付手段复杂了。这也体现了国家货币从绢帛本位到铜钱本位的变化。绢帛仍延续着魏晋南北朝制充当支付手段，但它不再成为价值尺度了”^③，这一观点不仅从比较史学的角度重新看待了唐代货币流通中的实物化倾向，还从国家财政制度方面分析了唐代货币史发展的重要脉络。

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以区域货币与区域货币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区域货币通史类著作亦不断涌现，这些成果无论从着眼角度还是使用材料都与一般货币史研究成果不同，对于以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方式考察唐代货币及货币经济面貌帮助很大。如秦子卿、任兆凤主编的《江苏历代货币史》主要以古代江苏地区的货币及货币经济为研究对象，而该地区的钱币私铸活动在唐代前半叶是较有特点的，故该书专门开辟章节并使用大量史料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得出了“唐代江淮间的私铸与恶钱流通是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在货币流通方面

① 李锦绣：《唐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② 魏道明：《略论唐朝的虚钱和实钱》，《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③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客观上却对于唐代的货币流通发挥了积极的补充作用”^①这一结论。唐代云南的通货面貌与中原有很大不同，而汤国彦主编的《云南历史货币》一书对唐代云南地区南诏政权使用贝币的情况亦有相关介绍，并系统分析了云南地区长期通行贝币的原因^②，对本书的写作亦有所帮助。另如肖怀远著《西藏地方货币史》一书，对吐蕃时期西藏的通货情况有宝贵的论述，尤其是引用西藏史籍《贤者喜宴》的相关记载指出唐时有“dong tse（铜子）”^③在西藏流通的信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除了前文提到的一些较成体系化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学者和研究者习惯于通过对单一问题的渗透开展讨论，也涌现出大量专著和论文，这些成果虽在结构上不具备全面完整的意义，但其针对某一问题进行精心挖掘后所铸就的理论深度却往往胜于宏观视角的研究成果，因此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有关唐代货币的诸多问题中，涉及唐代货币文物本身的文物信息整理和考证与断代方面的工作无疑是基础中的基础。但令人尴尬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分工作恰恰是唐代货币史研究最薄弱的环节，以至于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在脱离具体文物的状态下讨论货币经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货币收藏与货币研究重新在社会中流行，这一局面才开始有所改观。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与《中国钱币大辞典》两部大型货币图录相继出版，这两部图录所收拓片均来自各大博物馆藏品、考古发掘成果及名家收藏，在真伪问题上能够经得起推敲。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图录对于所收钱币的信息收集亦做到了尽可能的全面。其中，《中国钱币大辞典》不仅尽可能详尽地标明所收钱币的直径、重量和质地，还特设考古资料分册，对见于考古发掘报告的货币出土信息进行了可靠的整合工作，这对于货币史研究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在基础材料已经初步具备的前提下，货币研究与考证的热潮重新在社会中掀起，以《中国钱币》为代表的专业性研究平台的发展逐渐升温，大量涉及唐代货币考证与断代且有相当水平的专著和论文也相继问世。如杜维善、顾小坤所著《开元通宝系年汇考》，对唐代开元通宝的形制、材质、文字乃至铸造方法都有较为深入的

① 秦子卿、任兆凤主编：《江苏历代货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② 汤国彦主编：《云南历史货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③ 肖怀远编著：《西藏地方货币史》，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研究,尤其是其通过考古报告中的出土信息对开元通宝分期方面所作的尝试对唐代货币研究的影响最大。另外,在讨论开元钱形制时,该书重新将开元钱钱体所铸的各类星、月纹饰纳入了讨论范围,并通过实物图像揭示了月形纹饰与唐以前部分钱币币身上所见甲痕之间的联系^①,这对于揭示月纹的功能和含义有重要作用。再如日本钱币学家吉田昭二所著《乾元重宝钱谱》一书,不仅收集了作者所藏所见的大量乾元重宝实物拓片,还根据这些实物证据对乾元重宝的铸造时间、铸造方法等问题展开了极有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在该书中他着重介绍了“镶置法”在乾元重宝生产过程中的广泛使用^②,而由此产生的影响绝不仅仅停留在唐代铸造工艺领域一个范畴而已。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疆通古斯巴什古城遗址出土了大量唐代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引起了钱币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王永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以后唐对西域的坚守》一文于《中国钱币》杂志发表^③,大历元宝、建中通宝“西域铸造说”这一新观点正式问世,一时引起一场讨论大历、建中钱性质的风潮,以王宁《论安西都护府铸造“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的深层原因》^④、杨关良《对唐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辨析》^⑤、戴良佐《“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探讨》^⑥、陈鸿志《唐钱“大历元宝”析疑》^⑦、陈勇男《唐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版式及流通小议》^⑧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相继涌现,围绕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究竟为官铸正用品还是安西都护府所铸特殊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认为二钱为安西都护府所铸的“西域铸造说”凭借其理论优势替代一直流行的“官铸说”成为钱币学界的主流观点。尽管在笔者看来这一理论在许多方面仍有推敲的必要,但这种由钱币本身引发的学术讨论正是货币史研究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新燃

① 杜维善、顾小坤:《开元通宝系年汇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② (日)吉田昭二:《乾元重宝钱谱》,京都淳风堂2005年版,第85页。

③ 王永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以后唐对西域的坚守》,《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④ 王宁:《论安西都护府铸造“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的深层原因》,《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4期。

⑤ 杨关良:《对唐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辨析》,《浙江金融》1998年第7期。

⑥ 戴良佐:《“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探讨》,《新疆钱币》2002年第3期。

⑦ 陈鸿志:《唐钱“大历元宝”析疑》,《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4期。

⑧ 陈勇男:《唐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版式及流通小议》,《新疆钱币》2004年第4期。